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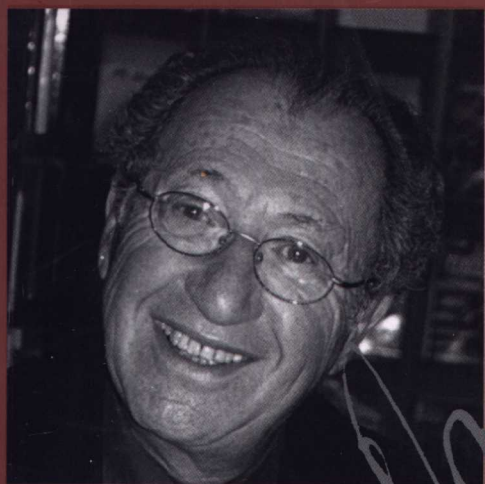


中 · 外 · 名 · 人 · 传 · 记

Zhong wai ming ren zhuan ji

弦裂

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家斯特恩回忆录



〔德〕赫尔穆特·斯特恩 著
李士勋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 · 外 · 名 · 人 · 传 · 记

Zhong Wai Ming Ren Zhuan Ji

弦裂

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家斯特恩回忆录

〔德〕赫尔穆特·斯特恩 著
李士勋 译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 2002 - 3332 号

Copyright 2002 by Hellmut Stern, Berlin German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弦裂: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家斯特恩回忆录/
(德)赫尔穆特·斯特恩著;李士勋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4

(中外名人传记)

ISBN 7-02-004110-8

I. 弦… II. ①斯…②李… III. 斯特恩 - 自传
IV. K835.16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10333 号

责任编辑:匡 钊 装帧设计:柳 泉
责任校对:王鸿宝 责任印制:周小滨

弦 裂

Xian Lie

[德]赫尔穆特·斯特恩 著

李士勋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60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375 插页 4
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8000

ISBN 7-02-004110-8/K·32

定价 16.00 元



作者像





我们对遥远的过去一无所知,因为我们不在场,我们对现在一无所知,因为我们在场。只有从自己亲身经历的过去,从我们在后来的回忆中,才能获得少许——很少一点儿——可靠的知识。

——维克多·克莱姆波尔

引自《1942—1945年日记》

第2卷第157页

一篇德国小学生作文

赫尔穆特·斯特恩生活在德国。从前,犹太人被纳粹迫害和屠杀。因为斯特恩先生是一个犹太人,他不得不和父母亲一起逃出德国。赫尔穆特的父亲是一个音乐家,所以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赫尔穆特)也成为音乐家。赫尔穆特不能和别的孩子一起练习音乐,因为他是犹太人。犹太人的钱被抢走了,许多犹太人很穷。大多数犹太人从犹太人团体得到救济,但是不够用。在德国,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赫尔穆特的父母亲向很多国家写信,问他们是否接受他们。除了中国之外,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接受。他们坐火车到了意大利,然后,他们换乘一艘大轮船。轮船开了四个月。他们经过许多国家。在中国哈尔滨,他们得到一个小房间。那时候,赫尔穆特十岁。在中国有许多外国人。他在中国进了一家俄国人的学校,进了一个六岁小孩的班级。他被嘲笑,因为他不会俄语。他也挨打。过了一段时间,情况好了一点儿。他在中国哈尔滨生活了十一年。1961年8月12日,他回到柏林。第二天他站在勃兰登堡大门前面唱歌。现在他还经常在柏林爱乐乐团唱歌。几年以后,他写了一本书,出了名。

多多问候

托内·多姆焦尼,十一岁,六a班

(选自柏林维丁区一个小学生在听了赫尔穆特·斯特恩朗诵《弦裂》一书之后写的一篇作文。)

目 录

1955

流亡之后,初次重逢	3
-----------	---

1938 年以前

家庭和 在柏林的童年	13
1933 年后	18
1938 年 11 月 9 日	28
开始流亡	31

1938—1949

在满洲里幸存下来	38
北京 1941—1942	50
音乐生涯的开始	55
战争结束	65
中国人的婚礼	75
在苏联占领下	79
在内蒙古	85
到齐齐哈尔去找郭将军	91
野鸡, 纈草和石头	94

1949

出境	102
在以色列从头开始	110
乐师交易所	117
在以色列爱乐乐团	123
不和谐的鼓声	132
第一次欧洲之行	139

1956

中间站美国	143
一种美国式的飞黄腾达	149
在圣路易斯和罗彻斯特	154

从 1961 年起

在柏林爱乐乐团	161
为什么回到德国?	167
与卡拉扬在一起的头几年	174
乐团音乐学院	184

1969—2000

1969 年的俄罗斯巡回演出	187
乐团,不为人知的机构	192
1979 年重返哈尔滨	196
失聪——突然坠落?	211
雷声滚滚,或者卡拉扬时代的终结	221
通向以色列的漫长道路	231

1990

以色列巡回演出 237

最后一章 243

译后记 李士勋 255

三十八年前，当我从流亡中归来的时候，没有人对我在纳粹统治时期和流亡期间的经历感兴趣。顶多也只是在朋友圈子里偶尔讲一两件我生活中的插曲。当时岁数和我差不多的同龄人都不想再听到关于那个时代的事情，更不用提那些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经历了战争的更年长些的人了。人们在忙着面向未来。然而，后来的一代新人却对纳粹时期、对反犹、对迫害和流亡提出了质疑。

现在，见证人的时代到来了。国内外关于那个如此恐怖的十二年中的许多细节、关于战争、首先是关于那场无缘无故的疯狂大屠杀(Shoa)的无数文章发表了，各种讨论会在召开，历史家纷纷站出来——到处都是时代的见证人！他们都曾经坐在麦克风和照相机前，在学校、在养老院或者在青年俱乐部，在青年人和老年人面前，现在仍然如此。他们朗诵自己的回忆录，那些回忆录有的文学性强些，有的文学性弱些。这样做很好，很重要。因为这都是很长时间以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们必须将那些历史公之于众。我们是那些最后的还能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做这件事情的人。我们之后，人们只能从第二手资料中了解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了。我们报告的是那个可怕的时代，我们虽然幸存下来了，然而我们每一个人的亲身经历却迥然不同。

这样一来，我也成了“职业的时代见证人”，像很多人一样，我也写了一本书。在公众面前朗诵它并且和人们、尤其是和年轻人一起讨论，这使我感到很开心。

即使这不是什么对于乐团服务的补充也罢！这里，任何指挥也不能强迫我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开始，这里没有人在我面前指手

画脚,告诉我应该发出颤音,虽然我已经在那样做,或者我应该再拉得轻一点,像我将要拉的那样——尽管我早就已经在那样做了。这里,我终于不仅是独奏者,而且也是指挥,我把两者合而为一!

1955

流亡之后,初次重逢

1955年,以色列爱乐乐团第一次到欧洲进行巡回演出,我是其中一员。当然,德国不在巡回演出计划之中——在战后那么短时间里那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有几个同事,都是像我那样的老柏林,决定利用演出后的假日,重游柏林——那几乎是二十年来的第一次。

那几位同事个个都比我年长;他们离开德国的时候都已经是成年人。豪斯特·所罗门,乐团的独奏号手,他离开德国的时候已经十九岁。另外的人当时都已经有了工作:我们的第一长号手海因茨·施费尔,双簧管和英国号手海因茨·贝尔格,小提琴家巴西雅·波利楚克。我最年轻,离开柏林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孩子。

我与豪斯特·所罗门的关系超过了其他所有的同事。他十九岁时,是传奇般的教授莱姆普特的得意门生,在逃出柏林之前,他是我父亲的老师,而我父亲当时已经五十六岁。那时候,我父亲意识到,仅仅作为一个声乐老师在流亡中将会遇到很多艰难,所以他决定再学点实用的东西——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就是“转变阶层”。可惜他决定学习最难学的铜管乐器圆号,仅仅是要回到他喜欢的乐器上来。在短时间内要学会吹圆号——而且在他那样的年

龄，简直没有什么比这更没有希望了。

1936年，豪斯特·所罗门应布洛尼斯拉夫·胡伯曼之聘，进入刚刚成立的巴勒斯坦乐团，因此能够顺利地离开德国。当我们1950年从中国到达以色列时，他就成了我们的投靠人。现在，我们在飞机上并肩而坐。豪斯特是个身强力壮的男人，此外，他也是一个业余摔跤手，喜欢重型摩托车。他的哈里-大卫逊摩托车在以色列曾经引起轰动。

当我们的飞机慢慢地飞近柏林时，我发现他的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他不再说一句话。我们在台坡尔霍夫机场降落，和别的旅客一起穿过一个长长的通道走向海关。当他听见周围的人都讲德语，而且是柏林方言的时候，他的眼泪突然夺眶而出，哭得浑身颤抖。终于，我们四个男子汉都嚎啕大哭起来。海关人员惊奇地问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说道：“您知道，我们全都是从流亡以后第一次归来，回到自己的故乡。”他没有检查就让我们通过了。我们不得不扶着豪斯特，我们怕他会倒下。

我们乘车去万塞湖畔，找到了波利楚克的熟人施罗德家。施罗德夫人是一位女钢琴家，俄国犹太人；她丈夫是一位商人，曾经成功地拯救了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半犹太血统的儿子。战争之前，他们家经常举行家庭音乐会。那里是当时所有被拒绝登台演出的犹太人音乐家们的聚会场所。我们促膝交谈，旧事重温，直到深夜。

第二天一早，我就上了城市快车(S-Bahn)。我们城市快车的气味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它立刻使我再次感觉到：我回到了柏林。

我想再看看我的家和我们家门口的那条街道。我慢慢地沿着西南林阴大道往前溜达，看着每一幢房屋，因为那里住着许多我们的朋友。其中一个弗朗茨·黑施费尔德博士，当时还在；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就和他有过书信往来。黑施费尔德博士曾经是司法

部的一位高级官员,1933年以后被革职查办。他的样子看起来就像纳粹时期人们树立的“雅利安人的典范”,一个典型的普鲁士官员。1933年以后,他每天早晨七点半夹着公文包离开家门,好像是去上班似的。然而,他不是去上班,而是去买几个小面包。那个男人几乎因为自己的命运而发疯。我父亲在出境之前经常对他说,只要有可能他应该和我们一起走,因为等待我们的只有灾难。可是,他回答道:“不,我不能走。我属于这个地方。”黑施费尔德博士属于后来成功地在柏林的孤立环境里幸存的不多几个人之一。他加入了社会民主党,战后又重新被雇用,在市政府担任很高的职务。就这样,我回到西南林阴大道77号他的美丽家里,又看到了他。

然后,我从我的朋友彼得·郝普家门口经过。他父亲总是给我们做好吃的香草奶酪和草药茶,他也演出卡斯坡赖特戏剧。他是作家。后来,我获悉,这个三口之家在十分冒险的状况下自己拯救了自己。1942年夏天,在被盖世太保传讯之后,他们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们写了一封绝命书,其中写明他们要自杀,然后就离开了家门,身上除了随身的衣服之外,什么也没带,然后他们就在人群中潜伏下来,那些人冒着生命危险收留了他们。他们在地狱般的环境里生活了三年,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被盖世太保发现,或者怕被陌生人举报,担心几天以后会为了一点面包而不得不爬出地面。彼得的母亲在绝望中鼓起勇气,不断地去找熟人,求人帮忙。1945年5月初,红军进城以后,他们一家人才敢于离开当时藏身的暖气地窖。

我继续向前走,来到西南林阴大道和劳巴赫大街街口,从前那儿有许多商店和一个冰道,冬天改成鱼店。那个店铺是施特姆家的,他们家的小女儿玛丽娅是我的第一个女朋友。在另外一个角落里是“村茨寡妇”的小店,在那里我总是用一枚六芬尼硬币或者一个十芬尼的硬币买奶油糖果。然后,我走近劳巴赫大街,心里很

害怕，直嘀咕我们家的房子16号到底还在不在。真的，这条大街的房子都完好无损——除了对面的那所房屋之外，一切如旧。连那所房屋旁边的房子，我的朋友、看门人的孩子海尔贝特·莱姆克曾经住过的房子也还在。



赫尔穆特·斯特恩一岁半时

起初，我根本没有回我们自己的家，我想打听一下海尔贝特家的情况。我站在大门口，看着门牌，那上面仍然写着：“莱姆克”，看门人一家和往常一样，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似的。我按了一下门铃，他母亲开了门：

“喂，请问……？”

“您不认得我了吗？”

“不认得了，您到底是谁呀？”

“我就是对面的赫尔穆特·斯特恩呀！”

“什么，小男孩，这不可能吧！”（我那时候总是被大家叫做“小男孩”。）